

历代名家精选集

赵伯陶 编选

袁宏道集

袁宏道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历代名家精选集

袁宏道集

赵伯陶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宏道集/赵伯陶编选.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
(历代名家精选集)

ISBN 978-7-80729-251-7

I. 袁… II. 赵…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17. 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877 号

- 书 名 袁宏道集
编 选 者 赵伯陶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 邮编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51-7
定 价 18.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6—82328881)

前 言

公安三袁，即长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老二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三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在明代文学史上，公安三袁以反对复古、标举性灵享誉后世，被称为公安派。以诗文成就以及影响而言，三兄弟中以中郎为最大，中道次之，宗道反居殿军。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庶子宗道》云：“(伯修)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袁稽勋宏道》又云：“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浚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堪称的评。

—

袁宏道，字幼学，又字中郎，号石公，又号无学、六休、石头居士，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史·袁宏道传》：“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万历十六年(1588)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一岁。第二年，已至京师欲应礼部试的袁宏道受其兄袁宗道的教诲，开始接触禅学与阳明心学。袁中道《石浦先生传》谓袁宗道有云：“己丑，焦公竑首制科，瞿公汝稷官京师，先生就之问学，共引以顿悟之旨。而僧深有为龙潭高足，数以见性之说启先生。乃遍阅大慧、中峰诸录，得参求之诀。久之，稍有所豁。先生于是研精性命，不复谭长生事矣。”从中可见焦竑、瞿汝稷、无



念和尚以及李贽等人对袁宗道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袁宏道在京师转受其长兄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此后数年，袁宏道就与其兄袁宗道一同参禅悟道，深究佛典，如醉如痴，几乎废寝忘食。他并且尝试用禅宗之学与儒家孔孟之书相互印证，又得阳明心学要领，终于走上亦禅亦儒的道路。

万历十九年(1591)春夏之际，袁宏道特意到麻城龙湖拜访李贽，两人一见如故，相得甚欢。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这次访学对于公安派文艺思想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清钱谦益《陶仲璞遯园集序》云：“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

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袁宏道殿试考中三甲第九十二名进士，房考官即为前三年考中状元的焦竑。在京师期间，袁宏道结识了袁宗道在翰林院的同事王图、陶望龄、黄辉、萧云举等，这些人日后即成为他的道友；袁宏道与同科进士江盈科、顾天竣等人也从此结为要好的朋友。袁宏道由于没有考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退而求其次，当小京官的希望也破灭，所以只能外放州县官。而这种结果与其人生价值取向并不相符，于是这位新科进士选择了请假归里一途。在家乡公安石浦河畔，袁宏道与外祖父、舅父以及大哥、三弟一起，从万历二十年秋至二十二年秋，度过了一段诗酒谈禅的优闲自在生活。期间，即万历二十一年五月间，兄弟三人又一同到麻城龙湖拜访李贽，袁宏道作《别龙湖师》八首五绝，其一云：“十日轻为别，重来未有期。出门馀泪眼，终不是男儿。”可见相契之深。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袁宏道赴京谒选，授吴县知



县，翌年三月到任。吴县为苏州府的附郭县，官务繁剧，赋税甲于天下，吏奸胥猾。袁宏道皆能洞悉其弊，并采取一定措施，革除秕政，且两袖清风，以身作则。致仕在家的大学士申时行，对这位二十八九岁的县令称誉有加，钱希言《锦帆集序》有云：“大都使君所为政者，先宽平，持大体，不以杀而以字。少师申公尝语余曰：‘二百年来，无此令矣。’”然而由于身体原因以及个人志趣，袁宏道终视县令为苦差；加之一桩后世不明原因的“天池之讼”，袁宏道处理意见又与当路相左，于是两年间凡七具牍解官乞休，并最终得到批准。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月以后，袁宏道开始游览东南山水，西湖、会稽、禹穴、兰亭、五泄、天目、黄山、新安江，皆留有中郎及其同行陶望龄等友人的游踪，最后暂居真州。期间，他心闲意逸，与友人参禅悟道，走上狂禅一路，并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小品与诗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已官居左中允的袁宗道致函中郎，令其赴京师再就选吏部。是年四月，袁宏道得授顺天府教授。此时袁中道也以荆州府岁贡入国子监读书，兄弟三人与友人方文儒、黄辉、顾天竣、陶望龄、丘坦等在京师城西崇国寺葡萄园结蒲桃社（或称葡萄社）。同仁间虽或诗酒唱酬，但蒲桃社终属禅社性质，习禅论学成为其主要内容。袁宏道写于是年腊月十二日的《大人寿日戏作》五古有句云：“社中诸法友，勉力事禅那。”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升授国子监助教。袁中道《中郎先生行状》：“逾年，先生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从狂禅归向净土，袁宏道的思想转变正是在此后一段时间完成的。

府学教授与国子监助教皆属清闲教职，两学中文典籍众多，两年的时间给予袁宏道涵泳阅览古人的绝好机会，对



于其哲学思想的转变以及文学观念的进展,大有裨益。万历二十八年(1600)三月间,袁宏道又升任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七月奉差河南周藩瑞金王府掌行丧礼,八月告假回家乡公安。期间长兄袁宗道猝逝京师,雁行折翅,令袁宏道百念俱灰;李贽自刎于通州狱中,也令中郎感念无已,宦情顿薄。袁宏道于是以告病为由,居于家乡所自开之碧柳数千株的“柳浪”六年,时而与一二名僧潜心道妙,研磨禅僧延寿之《宗镜录》与六祖《坛经》,时而游屐及于庐山、武当、武陵、桃花源,发为诗文,烟岚满纸,度过了六年自由自在的闲适生活。

两脚皆已踏入仕途的袁宏道,再作“山人”之想,谈何容易!父亲的催迫与生活的压力皆迫使其重回官场。万历三十四年(1606)秋九月,袁宏道偕弟中道等重返京师,以原官礼部主事补授。第二年秋七月,其妻子李安人在京去世,袁宏道适获得去蒲圻存问已致仕近三十年的右都御史谢鹏举的公差机会,沿水路南下,因得便还乡,途中得知自己已调任吏部主事。万历三十六年(1608)暮春,袁宏道回至京师就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兼摄文选司事,公务较诸礼部仪制司繁重了许多。面对明廷中央吏部选官积重难返的诸多弊政,袁宏道并非迂腐书生,而是能够有条不紊地澄清吏治,发奸擿伏,并立年终考察书吏之法;其所上《摘发巨奸疏》,即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干。万历三十七年(1609),袁宏道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七月间与兵部主事朱一冯同被委任典试秦中乡试,恪尽职守,所取多知名士。试后遍游秦中诸胜,回程继游河南洛阳龙门与登封嵩山等处,撰写诗文更上层楼。袁中道《蔡不瑕诗序》谓其兄中郎有云“自嵩华归来,始云吾近日稍知作诗”,可见登山临水对于他创作的影响。考功司任上,袁宏道多所调停,清望卓著。



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考功事毕,给假南归。因公安遭水患,袁宏道移居沙市,治硯北楼以居。是年中秋以后染病,九月初六日遽尔逝世,虚龄年仅四十三岁。

二

今人一提起性灵派中人,似乎总戴有一幅“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认为他们都是一些放浪形骸之外的游戏人生者。实际上,倡导性灵者中有许多人皆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三袁中以宗道、宏道最为突出。

向心禅悦本是出世的学问,置身仕途则是入世的津梁,两者表面上看似冰炭不相容,但古代文人士大夫巧妙调和化解,避免两者冲突也自有一套办法。宋代苏轼外儒内道,尽管世风齷齪,但只要保有心灵的一方净土,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即可化为处世的达观,宠辱不惊并能自寻其乐。长兄伯修“借禅以诠儒”影响了二弟袁宏道,作为一种信仰,无论是儒家不欺暗室的“慎独”精神,还是禅宗不立文字的参修顿悟功夫,其价值取向皆可促使信仰者避免与社会同流合污的无奈,达到心灵的净化。这一净化的外在表现就是自律甚严的对社会、对人生积极负责的态度。袁中道《石浦先生传》记述宗道:“先生为人修洁,生平不妄取人一钱。居官十五年,不以一字干有司。”袁中道《袁中郎行状》记述宏道:“为吴令,不取一钱,贷而后装。居官十九年,不置升合田。”清廉自守萃于兄弟二人,严肃的生活态度与洒脱宽广的心理空间,正是公安派倡导性灵的基础。惟有此一基础,他们才能严格区分开精神生活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从而找到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去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袁宏道治理吴县不



足两年，却官声甚佳，多有政绩；在吏部主事任上，更显示出他雷厉风行、不畏权贵却又通权达变的干练办事风格。

公安派强调自我，主张讲自己的话，不屑拾人牙慧，这无疑可与明中叶以后汹涌澎湃的个性解放思潮相应共振，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封建专制社会，人格的独立往往只能局限于精神层面，而非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公安派所谓性灵，依仗的就是人格独立的精神力量。袁宗道在《论文下》中强调：“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种言语。”认为：“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敢笑、敢哭、敢怒、敢骂，并有将之形诸笔墨的企盼，正是性灵的底蕴。类似精神在袁宏道笔下更为习见，其《识张幼于箴铭后》有云：“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独抒性灵，不肯从他人脚跟转，是公安派的共同主张与追求，而这种偏重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并没有破坏儒家上尊下卑秩序的实践指向，其文化品格也是以士林文化为本原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在致长兄的一封尺牘中谈到游览灵岩山西施履迹时的感受：“低徊顾视，千载若新，至欲别不能别。有情之痴，至于如此，可发一笑。”写于同年的游记小品《灵岩》亦云：“石上有西施履迹，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动。碧纒绡钩，宛然石髮中，虽复铁石作肝，能不魂销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不回避对于人生大欲的曝光，承认情与色的普遍与永恒，是一切性灵文人的特点。然而性灵文人所追求者，并非如世俗般只是物质层面肉欲的享乐，而具有更多精神层面的想象审美色彩，终究没有跳出士林文化的圈子。清初文人李渔《闲情偶寄》卷三段名言：“想当然之妙境，较身醉温柔乡者倍觉有情……幻境之妙，十



倍于真。”抱有某种理想审美态度的文人不是个别的，想象似乎更能满足他们的情感饥渴，宏道对于两千年前的美女西施发生兴趣，正是基于想象的魅力。《灵岩》一文最后，作者发抒感慨说：“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入，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向使库有湛卢之藏，潮无鸱夷之恨，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这番议论显然已超脱于情色，具有了某种启蒙的因素。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影响深远，他的另一些被目为“异端”的学说，也对三袁产生过积极影响。将上引文字对照李贽所编《初潭集》卷三的一段议论，我们即可发现这种影响的痕迹：“甚矣，声色之迷人也。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类，无不由此，可不慎欤！然汉武以雄才而拓地万馀里，魏武以英雄而割据有中原，又何尝不自声色中来也。嗣宗、仲容流声后世，固以此耳。岂其所破败者自有所在，或在彼而未必在此欤！吾以是观之，若使夏不妹(mò)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也。”

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李贽的“童心说”，展示出一条明代个性解放的途径，公安派正是沿着这一途径而发展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性灵”蕴含“童心说”的主旨，率性而为的个性张扬蕴育了这一文学流派的精神内涵。袁宏道《叙小修诗》称赏三弟诗文“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从言语到内容皆有所本，禅宗的话头机锋即其权舆。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记述岩头与义存参禅语：“(岩)头曰：‘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万历二十七年(1599)袁宏道《答李元善》尺牍亦云：“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强调诗文要写自己心中真话，不作虚情假意的矫饰之辞



或拟古模仿的赝品，可见禅宗对于公安派的深切影响。若从文学传统上追寻，公安派强调真情也渊源有自，并非首创。仅以明代为时限，如明初大家宋濂《叶夷仲文集序》即云：“物有所触，心有所向，则沛然发之于文。”较三袁时代稍前的唐宋派主将唐顺之尺牍《与洪方洲》亦云：“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如真见其面目，瑜瑕具不能掩，所为本色，此为上乘文字。”袁宏道极力推崇徐渭诗文，就是从其“自出手眼”以及变古创新的特色着眼的。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倡导者的处世态度密切相关，其间有禅宗思想的影响，也有道家思想的踪影。在北京任顺天府学教授期间，袁宏道撰有《广庄》七篇，所谓推广《庄子》其意，即阐释《庄子》之作。但无论佛、道，对于公安派的影响都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这在袁宏道身上最为突出。即如禅学，袁宏道经过不断参悟，有一个从狂禅走向净土，又归于禅净合一的过程，其有关尺牍就最能反映这方面的问题。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自唐宋以来即不断深入发展，在明代公安派的成长史中更得到鲜明的印证。

具体到袁宏道的文学创作，无论其诗歌还是散文，就文化品格而论，以士林文化为主体的本原而外，老庄、禅悦的影响自不可忽视，市井文化的浸染也当引起我们的瞩目。在封建社会中，市井文化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成长丰富的，明代中叶以后是市井文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从另一角度看问题，阳明心学与“异端”李贽的启蒙意识与个性解放精神，皆折射出市井文化的辉光。袁宏道《答李子髯》一诗云：“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情。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明代文人多有一股积极向市井文化靠拢的热情，即使以诗文复




古为职志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也曾将目光投向《锁南枝》、《山坡羊》等市井小曲。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云：“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空同先生初自庆阳徙居吕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略早于三袁的李开先《市井艳词序》竟疾呼：“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已沾染上浓厚的市民阶层意识，他们向某些传统意识发出挑战，承认私欲的合理性等，无不反映出市井文化的异彩。而以三袁为主的性灵派文人，则更为主动地汲取市井文化的营养，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曾致函其兄宗道：“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一般而言，士林文化强调传统的继承，趋向于保守；市井文化重视现实利益与物质享受，具有移风易俗的反传统力量。两种文化在一代文人脑中冲撞交融，整合变异，必然会令创作主体产生心理躁动，而躁动的心态只能靠某种精神的运作在才可以达到新的平衡。老庄、佛禅作为一种心理平衡器，功效卓著；可充分徜徉于想象世界的诗文创作也具有一定的心理平衡作用。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尺牍《李子髯》有云：“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异质文化的交融令晚明文学具有了崭新的文化品格。

散文较诸诗歌，不受格律、字数限制，发挥的余地较为阔大，因而已经具有崭新文化品格的晚明小品作为历代散文之一脉，就比晚明诗歌对后世有更深远的影响。袁宏道的散文，包括序跋小品、游记小品、传记小品、尺牍小品等，也比其诗歌的名声较大，究其本质原因，也不外乎这一缘故。



三



袁宏道的诗文集，生前即有多种刻本问世，如吴郡袁叔度(无涯)书种堂所刻《敝篋集》二卷、《锦帆集》四卷、《解脱集》四卷、《瓶花斋集》十卷、《广庄》一卷、《瓶史》一卷、《潇碧堂集》二十卷，总称《袁中郎七种》。其身后所刻全集，流传较广者为崇祯二年(1629)武林佩兰居所刊《新刻钟伯敬增订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为陆之选所编。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为1961年至1965年所写成的旧稿，直到1981年7月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所用底本即佩兰居四十卷本。是书对袁宏道诗文分别加以编年，并对诗文中所涉及的人物以及少部分地名或历史掌故做了言简意赅的笺注与校勘。是书的出版，对于明代性灵派研究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198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任访秋所著《袁中郎研究》(分上、下编，下编为《年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诗文撰写年代等，与钱伯城有异。1994年4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正·炳烛集》一书，对于《袁宏道集笺校》中的某些疏于考证之处以及有关典故等，进行了细致翔实的订正考辨，功力深厚，有益学林。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公安派研究渐入高潮，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周群著《袁宏道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钟林斌著《公安派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5月出版易晓闻著《公安派的文化阐释》、重庆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何宗美著《公安派结社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何宗美著《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等，皆对公安三袁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是《袁宏道诗文

系年考订》一书，对“涉及袁宏道诗文系年有疑异者 405 篇，例举异说，一一考订”，用力甚勤，廓清了不少头绪纷繁的问题。

袁宏道诗文的有关选注本，见闻所及者，如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8 月出版王骥、马传生、孙润祥选注《公安三袁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 年 10 月出版范桥、张明高编选《袁中郎尺牍》，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任亮直选注《袁中郎诗文选注》，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6 年 8 月出版熊礼汇选注《袁中郎小品》，岳麓书社 2000 年 10 月出版熊礼汇选注《公安三袁》等。这些选注本之注文或简或繁，入选篇目或多或少，各有特色，连同上述有关著述，皆为这次选注袁宏道诗文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六《袁宏道》言及性灵说之影响有云：

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如《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见白发》云：“无端见白发，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严陵钓台》云：“人言汉梅福，君之妻父也。”此本滑稽之谈，类入于狂言，不自以为诗者。乃锡山华闻修选明诗，从而激赏叹绝。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蛄蜣之转邪？予于中郎，盖汰其鄙俚之作，存其稍用意者，对之可以刮目矣。

所举三例，在袁宏道诗作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细读过袁宏道诗文者，特别是对于其诗，似



乎都有浅率粗疏、鄙俚不文的先人之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九著录《袁中道集》四十卷有云：“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复靡然而从之。然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学七子者不过贗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观于是集，亦足见文体迁流之故矣。”这一评论，对于三袁兄弟本身的批评不过是“惟恃聪明”，矛头所向，是所谓“学三袁者”，这当然不能由三袁负责。

细读袁宏道诗文，虽自出手眼者多，但所蕴含士林文化的比重仍然占有压倒性地位，学问并不浅薄，腹笥也颇充盈。他的文学创作不专意于用典，却能恰到好处；而其中对宗门一些公案或话头的信手拈来，也颇有顾盼自如的潇洒。注释袁宏道诗文，有时就需要不厌其烦，否则难以深明其意。本书选注袁宏道诗文，分为诗选、文选、尺牍选三部分，之所以将其尺牍独立于文选，就是考虑到袁宏道致亲友或尊长信函，遣词用语更为直率洒脱，与其散文特色区别明显，风格有异。诗选凡 37 题 48 首，文选 20 篇，尺牍选 13 篇，各以撰写年代先后为序。尺牍中有原题相同者，则加括注“一”、“二”，以便于称引。诗文中有关人物、用典，皆尽力注出，繁难处不厌其详，以免读者再行翻检查阅工具书之劳。诗文有意无意间化用前人作品语词或意境，也尽可能注出，以便鉴赏。所注释语词前后有重复者，简单的再行注出，以免读者前后翻检；复杂的加以缩减注出，再用“参见”法，指示前注语之位置，以省篇幅并便于读者深入理解。注释词语或整句、数句串讲，用冒号连接释文；再次解释其中语词，则用逗号连接释文，以使释文层次分明。异读字或冷僻字，其后括注汉语拼音与同音汉字。作品之后的“品评”，标明写作年代，并力求



征引有关材料,若能给读者或多或少的一些启发,也就达到编选者的目的了。

本书无论篇目选择还是注释内容、作品后的“品评”,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赵伯陶

2008年8月17日于京北天通楼



目 录

前 言 (1)

诗 选

古荆篇 (1)

江上(二首) (9)

得李宏甫先生书 (11)

述怀 (14)

长安秋月夜 (18)

紫骝马 (27)

赠黄道元 (29)

迎春歌和江进之 (31)

横塘渡 (35)

述内 (37)

答内 (39)

初至西湖(二首选一) (41)

赠虞德园兄弟 (43)

宋帝六陵 (45)

兰亭 (48)

听朱生说《水浒传》 (50)

过彭城吊西楚霸王 (53)

猛虎行 (55)

秋日同梅子马、方子公、周承明饮北安门水轩 (58)

